

苏 阳 冯仕政 韩春萍/主编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阶级



*Social Class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苏 阳 冯仕政 韩春萍 / 主编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阶级



*Social Class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阶级/苏阳, 冯仕政, 韩春萍主
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97 - 1730 - 1

I. ①中… II. ①苏… ②冯… ③韩… III. ①阶级
分析 - 中国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1390 号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阶级

主 编 / 苏 阳 冯仕政 韩春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王 绯

责任编辑 / 郑 嫵

责任校对 / 李 娟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1.4

字 数 / 189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730 - 1

定 价 / 3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导论：把阶级还给不平等研究	苏 阳 冯仕政 韩春萍 / 1
第二章 阶级与转型中国政治	赵鼎新 / 13
第三章 国家组织与社会不平等 ——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阶级分化	冯仕政 苏 阳 / 30
第四章 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 ——利益组织化结构和参与特征	张 静 / 67
第五章 法团主义努力与市场化 ——关于中国工会角色的实证研究	金明植 / 84
第六章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 ——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	周飞舟 / 108

第七章 特权景观：“封闭式社区”和上海的 新兴中产阶级	鲍存彪 (Choon-Piew Pow) / 155
第八章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收入与就业 ——以上海浦东、浙江温州和四川广元为例	楼培敏 / 173
第九章 贫困何时成为一个问题 ——改革后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贫民”的产生	赵文英 (Mun Young Cho) / 188
第十章 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及其自我认同与公民意识	王 欣 / 201

第一章

导论：把阶级还给不平等研究

苏 阳 冯仕政 韩春萍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373），但在当前，中国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平等，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政界和学界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解都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作为唯一正确的指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是否贯彻阶级分析方法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之一。与“阶级斗争”这样一种长期而且密切的联系，使作为一种学术视角的阶级分析完全被政治化了，甚至被贴上了极“左”的标签（郑杭生，2002）。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极“左”意识形态受到批判，阶级分析不但从党和国家的政治论述中淡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大家也是对其避之则吉。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阶级分析是与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采用阶级分析视角就是在提倡极“左”，就是与当前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格格不入。

事实上，作为一种理论视角的阶级分析从来都不是极“左”

思潮的原因，更不是极“左”思潮的产物。阶级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甚至不是马克思最早提出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1995：547）在马克思之后，西方一些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阶级分析做了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的阐述和修正（比如，赖特，2006），这使阶级理论在社会不平等研究中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如果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1956：650~651），那么我们可以说，极“左”分子到处打着阶级分析的幌子，就像他们到处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一样；就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极“左”分子盗用而无损其光芒一样，阶级分析被极“左”分子滥用也无损其作为理论视角的魅力；就像阶级分析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在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时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并不意味着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否定。恰恰相反，在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是为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和集体行动的风险，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进改革开放。

二

与对阶级分析视角的回避联系在一起的，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分析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社会学中的兴起。1989年

以来，随着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在中国的流行，社会分层分析更是牢牢地控制着有关社会不平等研究（可参见 Bian, 2002: 6; 张宛丽, 1988, 1990; 陈那波, 2006）。在此过程中，阶级分析被彻底边缘化了。这样一种状况是学术逻辑和政治逻辑双重挤压的结果。从政治逻辑上说，在中国政治史上，阶级分析曾经与极“左”意识形态过从甚密，随着政治气候的转变，这样一种历史瓜葛不仅导致阶级分析在政治上失宠，而且成为学术研究的负累；从学术逻辑上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由于布劳和邓肯的开创性研究（Blau, Duncan and Tyree, 1967），社会分层研究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适合“中观社会学”（middle-range）的研究概念、命题和方法，而阶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于思辨的社会哲学层面，在实证研究占据主流的社会学中不受欢迎自然是不问可知了。

阶级分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边缘化了，分层分析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崛起了。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自然，学界的共识是如此默契，甚至几乎没有人申辩一下阶级分析与分层分析之间的差别，以及这样一种兴替的必要性。在很多人看来，阶级分析与分层分析之间的差别不外乎这么几点：第一，阶级分析是一元论的，而分层分析是多元论的，即阶级分析只关注特定人群的经济地位，尤其是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地位，而分层分析则关注收入、权力、声望等多个维度（比如，仇立平, 2006; 李强, 1993）。甚至可以说，凡是社会所稀缺的从而必须有差别分配的资源，都可以构成分层的维度。第二，分层分析以职业地位为焦点，而阶级分析以政治地位为焦点（陆学艺, 2002）。第三，相应的，阶级分析具有深厚的政治色彩，不可避免地卷入价值取向，从而影响分析的科学性；而分层分析所关注的职业不涉及政治色彩，在学术研究中可以更好地做到价值中立，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事实上，分层分析和阶级分析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基本想象（或者说基本假设）不同。简单地说，分层

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功能论的，而阶级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冲突论的。在功能论看来，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演生过程，功能论通常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为了生存和发展，一些基本的功能必须得到满足；为了满足这些功能，社会必然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地位结构；根据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社会成员被一只无形的手配置到社会结构中的某个位置上。根据这个理论，社会不平等是两方面因素互相契合的结果：一方面是适应特定社会需要的地位结构，另一方面是满足特定社会需要的个人能力。社会不平等就是地位与个体相匹配的过程和结果。根据这个逻辑，社会不平等是劳动力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某个个体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因为他的个人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必须给他更好的回报；反之，某个个体如果落到较低的社会地位，也不是因为剥削和压迫，而是由于其自身的能力决定了他只能获取那些回报较低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布劳和邓肯模型所想象的“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过程。显然，在布劳和邓肯看来，这个过程是天然的，因而是公平的。在“地位获得”模型看来，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体系是社会系统满足自身需要的主要结构形式，职业地位也是个体的首要地位，因此，职业分化成为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内容。

与功能论不同，在冲突论看来，所谓“地位获得”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具体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说，社会成员的地位并不是一个通过个人努力、凭借个人能力去“获得”的过程；相反，它本质上是一个支配与服从的过程。在特定生产方式条件下，某个阶级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就会按照本阶级的需要去“分配”社会地位；分配的目的不是满足所谓“社会”的需要，而是本阶级的需要；分配的过程不像某些意识形态所粉饰的那样，是一个充满温情的过程，也不是“地位获得”模型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冷酷但很公平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强制的过程。在支

配与服从的大框架下，即使有一个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则也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制定并执行的。既然如此，那么分析的焦点就不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获得过程，而是统治阶级强制性的地位分配过程。马克思还认为，在私有制被彻底消灭以前，社会地位的分化最终会表现为两个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垒，而不会出现多种社会地位维度相互分割，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碎片化”的局面。

由于对社会不平等过程的基本想象和假设不同，分层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基本理论思路也就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分层分析是社会中心论或多元主义的，即以社会为中心分析其中各制度设施（比如家族、市场、关系网络、文化传统，等等）之间的促进或制约关系，通过分析这种促进或制约关系来解释社会不平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或政治系统的结构被认为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非但不能控制社会的运作，反而是受社会支配的。与此相反，阶级分析一般是国家中心论或精英主义论的。它认为，整个社会过程，包括社会不平等，是受精英阶级，特别是其统治工具——国家控制的，因此，理解社会不平等的关键不在于了解社会制度设置之间的促进或制约关系，而在于了解精英或国家内部的运作过程，包括决策、执行、派系，等等。

三

我们编辑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在关于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视角。之所以要重新引入这个视角，不是因为编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或正在分裂为两大毫不妥协的“阶级”，更不是因为编者想鼓动“阶级斗争”，而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对两个问题的重视：第一，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不只是一个市场性的职业分化的过程，而是如阶级分析视角隐含的冲突论假设所预测的那样，其中蕴涵着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第二，

国家及国家的政策导向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在分化过程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冲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如果说在 1998 年以前，社会冲突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 1998 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不需要再论证了。1998 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和医疗卫生改革四大改革的集中推出，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底层社会”或“弱势群体”。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场改革及其所造成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的存在所造成的社会冲突，以及它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更大的风险，都是社会学迫切需要理解的问题。而理解这个问题，是社会分层研究无能为力的。因为在它的理论想象中，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和平的市场竞争过程，是没有什么冲突的，自然也就不会发展出理解这些冲突的概念和理论来。基于功能论的理解假设，社会分层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到底谁跑在前面？即，精英到底是怎样崛起的？在他们看来，精英和底层的分化是一场公平竞争的结果，精英和底层的形成适用的是同一个规则，因此，只要理解了谁跑在前面，就自然理解了谁跑在后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冲突论的观点，精英的形成过程与底层的形成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依靠的是剥夺，后者是被剥夺的结果。剥夺者和被剥夺者不可能适用同一个规则。

社会冲突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学术界日益强烈的关注。在政府方面，“弱势群体”概念和“和谐社会”政策的提出本身，即已暴露了该问题的严重性。在学术界方面，有学者提出了“断裂社会”并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另有一些学者则重新拾起阶级（阶层）概念，以期在社会分层研究之外对社会冲突问题有新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这一关切的延续。正是基于这一关切，读者可以发现，本书的好几章都是以“弱势群体”为研究对象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在塑造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问题，

它与第一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承认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过程存在着社会冲突，甚至是很严重的社会冲突，那么，在学术研究中就不得不把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置于非常显著的位置。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社会机构比国家对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有更大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暴力的垄断机构，国家不但可能通过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潜在地消除或引发社会冲突，而且会在社会冲突已然爆发之后，介入其中进行调节。国家的巨大能量决定了它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发展走向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国家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这决定了，相对于新兴的市场，国家固然不是完全自主的，但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性（Evans et al., 1985）。因此，把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行动自主性的组织来分析，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不平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社会分层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国家虽然频频出现，但在那里，国家往往只是一个没有目的或意志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的作用只在于为社会各类人群提供往来驰骋和自由竞争的场地，但本身并不介入这场比赛。而事实上，国家不但是一个“制度体系”，而且是一个行动体（actor），它是有价值偏好的，并且能够通过政策把自己的偏好表现出来，然后通过国家机器把它执行下去。尽管它的意图并不总是能被完全实现，但它所造成的有意的或无意的影响是其他任何社会机构都不能比拟的。基于这一认识，本书非常关注国家组织对社会不平等形成过程的影响。

四

2006年5月，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亚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UC Irvine）和海外青年中国论坛（The Overseas Young Chinese Forum）的共同资助下，海外青年中国论坛在美国加州 Costa Meza 召开了2006年年会，年会主题为“中国社会转型中

的阶级”。本论文集的作者都是这次会议的发言人，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比如张静（北京大学）和赵鼎新（芝加哥大学），也有尚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博士生。

除导论外，本书共收入9篇论文，分别构成导论之外的第二章至第十章。其中，第二章为赵鼎新的《阶级与转型中国政治》。该文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阶级的理解及其发展；第二，阶级政治在近代西方和中国冲突性政治中的地位、发展轨迹及背后原因；第三，当前中国冲突性政治的现状和可能发展方向。作者认为，阶级是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认同感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若干个大型社会认同之一。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国家的性质以及国家的阶级政策对阶级认同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前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分化，但由于中国政府在处理集体抗争事件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阶级之间的冲突有向民粹主义发展的倾向，统一的阶级意识和认同难以形成，因而尚构不成阶级政治。

中国河南省的南街村是一个在海内外都受到高度关注的“明星村”。1981~2000年，南街村坚持不懈地按照“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进行社会改造，最终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第三章冯仕政和苏阳的《国家组织与社会不平等——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阶级分化》讨论了南街村的阶级分化过程。研究发现，南街村虽然立志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但饶有意味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本身不但没有削弱社会不平等，反而造成了村民与非村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这一过程生动地展现了组织在塑造社会不平等过程中的强烈影响及其限度。这个个案提示我们，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过程既不纯粹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分化过程，也不纯粹是一个完全控制性和操纵性的国家支配过程。国家和社会各自的行动能力及其边界在什么地方，这种行动能力和边界的形态对社会不平等的形态有什么影响，又通过什么机制发生影响，

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四章是张静的《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利益组织化结构和参与特征》。该文认为，在中国城市中，社会利益的组织化不是经由自发的、多元的社会团体形式，也不是根据收入或财产差别状态的阶级群体形式，而是通过工作单位的行政建制达成的。这一结构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城市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它为什么往往表现为单位（机构、部门）的利益竞争，而主要不是表现为阶级等身份集团的利益竞争，而且有助于解释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冲突性的元素，却没有对宏观秩序的基本稳定造成想象中的威胁。原因在于，单位是分解社会利益集结和组合并“负责”传输它的组织化渠道，一旦这个机制停止工作，社会利益的聚合和上达将面临严重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说，单位结构及其政治功能，能够解释中国高速变迁中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第五章《法团主义努力与市场化——关于中国工会角色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金明植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中国政府为了控制劳资关系做了制度上的努力，为什么劳资纠纷数量依然有所增加？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工会是发挥关键作用的准国家机关，政府通过工会一直控制着劳资关系，这在公有制领域尤为明显。第二，在工人权利常被忽视的非公有领域，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没有效力。第三，虽然收入差距加大和工作条件恶化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但这些诱因并没有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提高有很大影响。亦即，中国目前劳资纠纷的增加，并非建立在阶级意识增强的基础上。

第六章是周飞舟的《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该文试图通过分析政府行为来观察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变。通过对税费改革过程中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考察，作者发现，过去一直依靠从农村收取税

费维持运转的基层政府正在变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总的趋势是由过去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在这种形势下，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政权转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政权。

在第七章，鲍存彪讨论了上海的封闭式社区。作者认为，封闭式社区是一种以阶级、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区别为基件而生成的空间划分，是中产阶级享受优质生活的一种特权性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封闭式社区是保护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利益的场所，同时也是培养新兴中产阶级情感和阶级性格的“施教场所”。

土地征用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普遍和广泛的手段。在第八章，楼培敏的研究显示，土地征用后，被征地农民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与样本地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缩小，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消费结构接近城镇居民，但收入仅维持在当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就业难和社会保障缺失是被征地农民面临的最大困难，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制度创新、政策扶持、政府指导、农民自救”四者互动是提升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生活状况的重要策略。

赵文英在第九章《贫困何时成为一个问题——改革后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贫民”的产生》一文中讨论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该文旨在为理解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提供一个背景。为此，作者探讨了中国学界、政界和社会层面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种种流行观念，并仔细考察了这些观念是如何界定中国“城市贫民”的。作者发现，在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下，这些说法之间不但存在诸多差异，而且经常相互矛盾。据此，作者认为，“城市贫民”在形成一个政治性阶级的道路上，除了面临城乡分割和单位制等体制壁垒外，还面临文化价值壁垒。

最后，第十章是王欣的《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及其自我认同与公民意识》。该研究的目的是确定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的社会群体。抽样调查研究显示，尽管这个阶层有许多共同的社会属性，但大多数受访者对于他们身处中间阶层的身份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阶级意识。

参考文献

陈那波，2006，《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第5期。

仇立平，2006，《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第4期。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19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埃里克·赖特，2006，《阶级》，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强，1993，《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张宛丽，1990，《近期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张宛丽，2000，《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第1期。

郑杭生，2002，《为什么用阶层而不用阶级划分社会群体》，《中国党政干论坛》第4期。

Bian, Yanjie,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91-116.

Blau, Peter Michael, Otis Dudley Duncan, and Andrea Tyree,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London: Wiley.

Evans, Peter B. ,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